

吴承明全集

第一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吴承明全集

第一卷

专著
(1)

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

帝国主义在华投资

美帝在华经济侵略

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

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摄于二〇〇七年





自述

关承明

我童年生活在北京，可算个老北京。当时北方小学教育落后于南方，父亲叫我改念私塾，读了两年“四书”和古诗文，后来发现大有好处。不过，这时私塾已有一位女塾师，姓陶，教英语和算术。一天，这位陶老师悄悄对我说，她是“革命党”。不久，陶老师不见了；接着，北伐军进入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爱国运动。这时我在以理科著名的北平市立四中高一班。学校的运动是师生联合开展的，物理学老师李直钧、化学老师刘伯忠都是领导人。次年春，外部压力日深，老师退出运动，学生秘密筹组学联。学期末，黄诚和我被教务处召见，被客气地告之：“你们赶快离校吧。”这时我想起屈原的话“余既不难夫离别兮”，我含泪向使我们受益良深的李老师、刘老师告别。解放后，两位老师都年已古稀，被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黄诚和我当时都怀有工业救国的理想，便联袂考入了在天津的北洋工学院高中部。北洋是个老牌大学，与京师大学堂齐名。这时虽由教育部改称学院，校内仍自称北洋大学，高中部仍称预科，两年制。又因院长王季绪“绝食抗日”，闻名遐迩。但我们进校后，王已被免职，专任教授。北洋预科已是专

任专业基础教育，课程繁重，讲课都用英语。我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学，教授是德籍丹麦人卜德，口齿不灵，“蹉跎为患”。接着，学校发生了两次“学潮”。“学潮”是报纸上所用名词，实际是抗议日本便衣队制造的“津沽变乱”。那时津沽一带已是日本人天下，北洋学潮，非同小可。学期末，黄诚和我再一次被召见口谕：“准许预科毕业，但不准进入本科。”

于是，1934年夏，黄诚和我再一次联袂转学，考入清华大学，他进工学院，我进理学院。这时已是华北危急，国事日非。1935年夏，黄诚和我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旋即爆发“一二·九”运动，我们都成为救国会成员。工业救国已成泡影，于是我转入经济系。没想到经济学竟成我终生爱好的学科。只是当时奔走救亡运动，甚少读书，辜负了陈岱孙等名师的教导。学期末，学校布告开除四名救国会委员，包括黄诚和我。

1936年夏，我再次转学。那时北京大学只历史系和哲学系招转学生，我考进了历史系。在北大，从师孟森老夫子和钱穆教授，我对史学产生了深厚感情。但仅仅一年，“七七”事变爆发，黄诚和我都投笔从戎。黄诚后来牺牲于上饶集中营。我则于1938年末回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环境艰苦，但却名师如云。在这里，我从师陈寅恪、姚从吾、郑天挺等大师学史，兼师刘文典老先生读古典文学，1940年以考据论文毕业。

1944年春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当时是凯恩斯主义当世，哥大则是克拉克学派走势，我的导师又恰是反凯恩斯主义的。我对此采取客观态度，而注意各学派演变的轨迹，这也许是受学历史的影响。直到今天，对一些新兴学派如科斯等新制度学派，我还是这样。同时，我比较注意方法论，对那时尚在萌芽状态的经济计量学颇感兴趣，曾以一篇《货币数量分析》获

金钥匙奖，^①这也许是受学过一点理工的影响。1946年，我获得哥大硕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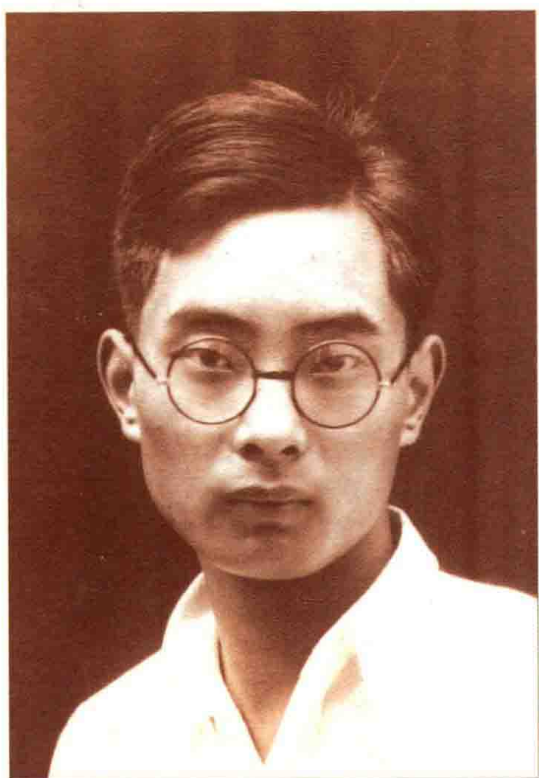
我在求学过程中，遍走了理工文法学院，无所专长，直到年近花甲，才选定了经济史这个专业。再次用屈原的话说：“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学习生活的曲折，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但现在想来，也有好处。做学问要眼光开阔，博闻广识，然后求专。我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深感过去的一点理工知识，乃至私塾古文，都常派上用场。再则，正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使我在学校教育之外，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1946年我开始在业余时间做些系统研究，就不觉陌生了。

另外，我还想起两件事。一是“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三年。当时的条件，只能读马列。我精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补学现代物理学（过去学的是古典物理学）以及现代生物学，后来觉得受益无穷。另一事是我进入七十岁以后，因老伴瘫痪，卧床不起，需要照料，我们暂住女儿家。斗室间写作困难，病榻旁尚可读书，我便读了不少当代经济学和史学理论的书，大开眼界。觉得过去所学，太狭隘了。活到老，学到老。每种学问都是日新月异的，最怕一叶障目，要博而后专，专后还要博。这是我的小小体会。

（原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第172～173页）

^① 此处吴承明先生记忆有误。1945年吴承明先生获得美国贝塔-西格玛-伽玛（BΣΓ）荣誉学会颁发的“金钥匙奖”，获奖论文是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部选修多德（D.L.Dodd）的金融市场课程后撰写的论文，其中译概要本《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发表于《证券市场》第2卷第2期（1947年5月），收入全集第5卷第132～149页。——编者

学生时代（一九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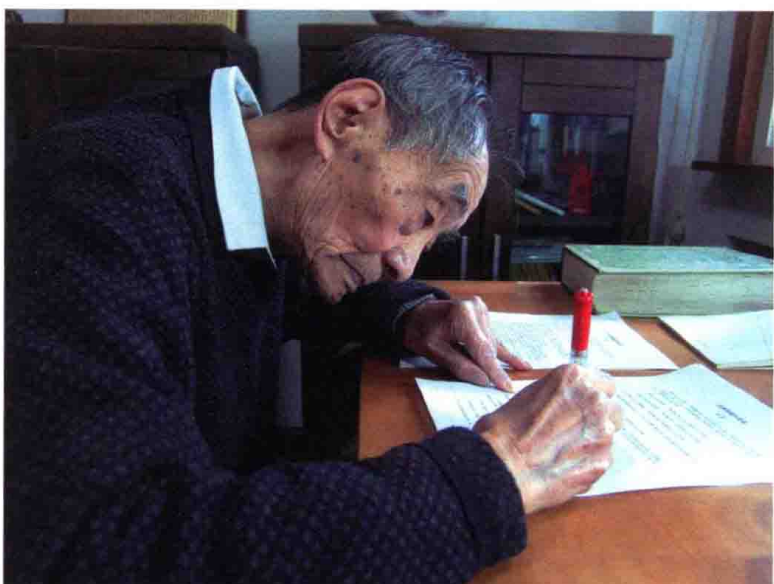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毕业（一九四〇）





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报告
(一九八六)



工作中(二〇〇九)

摄于二〇〇八年



九十一岁生日时与同事、学生在一起
(二〇〇八)



全家福（一九八二）



与家人外出游玩（二〇〇九）



《吴承明全集》卷次

● 第一卷·专著（1）

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
帝国主义在华投资
美帝在华经济侵略
英国在华企业及其利润
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 第二卷·专著（2）

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 第三卷·经济史研究（1）

● 第四卷·经济史研究（2）

● 第五卷

经济评论
研究与创新
书评与序言
会议发言

● 第六卷

未发表的论述
通信
诗话
外文论著
附录

出版说明

吴承明先生（1917～2011）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承明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在经济史园地笔耕不辍，为学术界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影响至为深远。吴承明先生逝世后，他的同事、学生及后人对其作品进行了全方位搜集与整理，汇编成这部《吴承明全集》，基本涵盖了吴承明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至逝世前所撰写的全部作品，包括相当数量的未刊作品。

现将《吴承明全集》相关编辑事宜说明如下：

（一）《吴承明全集》共分六卷六册，由“专著”“经济史研究”“经济评论”“研究与创新”“书评与序言”“会议发言”“未发表的论述”“通信”“诗话”“外文论著”“附录”等11部分组成。具体卷次分布情况请见前附“《吴承明全集》卷次”。

（二）收入《吴承明全集》的论著，主要分三种情况处理。

1. 著作：作者进行修订的著作，采用修订后的版本；作者没有进行修订的，或据手稿，或据已有的版本排印。书名仍旧。原有“序言”或有取舍。每部专著前附有“编者说明”，介绍其版次、增补、修改以及收入《吴承明全集》时所采用的版本等情况，可资参照。

2. 已刊文稿：由于许多论文已经单独或分别收入《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吴承明文集》（刘兰兮整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等文集，收入《吴承明全

集》时基本以收入各种文集的时间最晚者为准；没有收入各种文集的论文以最初刊发的文稿为准。已刊论文仅在文末注明原始出处，不再注明所收入的各种文集。

3. 未刊文稿：基本是以作者的同事、学生及后人提供、整理的文本为准。

（三）关于《吴承明全集》论著的排序，第一卷、第二卷、第五卷与第六卷（第六卷中的“通信”以与作者通信者的年龄为序，年长者居前）基本按照论著的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为序，时间先者居前。第三卷与第四卷所收入的“经济史研究”论文情况比较复杂，不是按论文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基本是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国工农业资本的构成、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资本输出、市场理论与市场史、中国近现代化问题、经济史理论研究以及历史观与方法论等专题编排。考虑各专题之间存在相当多的关联性与延伸性，因此没有再设立专栏，而是统一冠以“经济史研究”之名。收入各专题之中的论文，基本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

（四）关于《吴承明全集》的注释，作者原有注释保留。编者所加注释一般为说明性的，并标明编者字样。

（五）关于《吴承明全集》的表、图，作者原有的表题、图题保留；原来没有表题、图题者由编者酌补。原无表、图序号者，或原有表、图序号但需要调整者，编者均重新编号。凡表、图类似修改均不另行出注说明。

（六）关于《吴承明全集》数字的用法，由于原论著写作、发表的时间跨度大，存在大量汉字数字与阿拉伯数字混用的情况，现凡世纪、年代及各类经济统计数字等均用阿拉伯数字。四位以上的整数或小数不加千分位符号。

（七）《吴承明全集》采用简体横排。但涉及古籍中的一些人名、地名或专有名词等，为避免引发歧义，根据内容需要适当保留了一些繁体字与异体字，不一一注明。

（八）《吴承明全集》不设总目录，只设分卷目录。

（九）《吴承明全集》不连续编排页码，每卷单独编排页码。

（十）吴承明先生著述涉及多种学科与多种文字，囿于学力，我们虽经多方努力，但在《吴承明全集》的编辑、校对的过程中舛误或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序 言

方 行

经济史学大师吴承明先生 1917 年生于河北滦县。1934 年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习。以北平爱国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一二·九”运动。1936 年秋被迫离校，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1940 年毕业。1943 年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1946 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47 年初，在上海任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新中国建立后，1958 年任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并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2006 年 8 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吴承明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辛苦耕耘，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密切结合的典范。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

吴承明先生精通计量经济学，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健全的统计制度，数据资料很不完整。他用自己专研的理论和方法，对不确切的情况，做出比较妥切的判断。从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近代

资本集成、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产值、市场商品量等数量分析的专题论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水平，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评估，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市场理论与市场史

吴承明先生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深厚根底，深知市场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也常在市场上反映出来。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着手市场问题的研究。他从交换和市场史的研究中，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提出交换先于变革自然的“生产”，并经历了劳动交换、商品交换、智能交换等五种形式。他从构建交换与经济模式的发展中，更提出了交换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导数的论点。在实证研究方面，他运用大量史料和计量方法，从商路、市镇和商品运销等方面，研究了明代国内市场、清代国内市场和近代商品流通的宏观模式。20 世纪末，又进而将市场研究提升到从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的变化入手，以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

对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他提出事物内部具有能动因素，甚至对立物之间也具有互补功能的论点。他通过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实证考察，指出传统农业不仅可以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并且还可以提供剩余。充分利用手工业和传统的手工业与农民经济结合的功效，可能走出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他以经济为主，以社会思想为参照，从物质层次进而到制度层次，乃至思想层次，论述了 16~17 世纪出现的现代化因素，并且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层面因素互动的结果，不仅要考察物质发展的量，还要考察制度变革的质，两者具体化为社会变迁。在中国，在这种考察中，要特别注意国家的正面和负面作

用。而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在最深层次上都要受意识形态的制衡，即儒家思想的制衡。

历史观与方法论

从 20 世纪末起，他又致力于经济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以探求学术思想的升华。他坚持发展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有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他提出中国的封建主义由于吸收和容纳了异质的商品经济，并将它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能动因素，在 16 世纪以后就发展为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他反对用理论模式推演历史。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这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研究历史就是研究过去我们还不认识或不清楚的事情，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时代思潮的进步，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再认识。历史就是无休止的再认识。他重视实证主义，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史不可须臾背离的基本方法。历史应当有价值评判，实证主义不能作为价值评判是其局限。经济史的价值评判，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量，即采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应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研究历史事件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代乃至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他主张“史无定法”，应当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种学派的方法，均可采用。他强调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是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曾经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从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着手，涉及的资料达数千万字。主持编辑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八种。接着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不幸许涤新于 1988 年逝世，因之该书从规划设计、重点章节撰写到修改定稿，均由他主持，于 1992 年完成。从搜集资料算起，寝馈其中凡三十余年。该书

分析了不同时期外国资本、官营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消长、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水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崎岖道路。这部著作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推崇。

他的著作必将传遗后世、嘉惠士林！

2011年11月30日